



冯骥才·主编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雷海宗·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冯骥才·主编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雷海宗·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 雷海宗著. -- 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8.6

(文史存典系列丛书·文化卷)

ISBN 978-7-5205-0197-2

I. ①中… II. ①雷…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②
军事史—研究—中国 IV. ①K203 ②E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3470 号

出品人: 刘未鸣

责任编辑: 窦忠如 张蕊燕

策划人: 窦忠如

责任校对: 程铁柱

装帧设计: 润一文化

实习编辑: 孟凡龙 王 丰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毫米 × 889 毫米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文史存典系列丛书》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冯其庸	冯骥才	刘庆柱	许嘉璐
杨乃济	吴良镛	陈建功	李学勤
李敬泽	罗 杨	郑欣淼	耿宝昌
舒 乙	谢辰生	傅熹年	樊锦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各个领域都熠熠闪光，文史著述灿若星辰。遗憾的是，“五四”以降，中华传统文化被弃之如敝屣，西风一度压倒东风。“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我们在激荡的世界文化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因此，国人需要文化自觉的意识与文化自尊的态度，更需要文化精神的自强与文化自信的彰显。有鉴于此，我社以第五编辑室为班底，在社领导的统筹安排下，在兄弟编辑室的通力合作下，在文化大家与学术巨擘的倾力襄助下，耗时十三个月，在浩如烟海的近代经典文史著述中，将这些文史大家的代表作、经典等遴选结集出版，取名《文史存典系列丛书》（拟10卷），每卷成立编委会，特邀该领域具有标志性、旗帜性的学术文化名家为主编。

“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奭。”经典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篇一篇具体的文章，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更有学术传承的崇高价值。此次推出第一辑五卷，包括文物卷、考古卷、文化卷、建筑卷、史学卷。文物卷特请谢辰生先生为主编，透过王国维、傅增湘、朱家溍等诸位先生的笔端，撷取时光中的吉光片羽，欣赏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考古卷特请刘庆柱先生为主编，选取梁思永、董作宾、曾昭燏先生等诸位考古学家的作品，将历史与当下凝在笔端，化作一条纽带，让我们可以触摸时空的温度；文化卷特请冯骥才先生为主编，胡适、陈梦家、林语堂等诸位先生的笔锋所指之处，让内心深处发出自我叩问，于

夜阑人静处回响；建筑卷特请吴良镛先生为主编，选取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诸位哲匠的作品，遍览亭台、楼榭、古城墙，感叹传统建筑工艺的“尺蠖规矩”；史学卷特请李学勤先生为主编，跟随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等诸位史学大家的笔尖游走在历史的长河中，来一番对悠悠岁月的探源。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我们编辑的学识，加之时间紧促等缘故，遴选的文章未必尽如人意，编选体例未必尽符规律，编校质量未必毫无差错，但是谨慎、认真、细致与用心是我们编辑恪守的宗旨，故此敬请方家不吝指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年4月16日

序

本书上编的几篇文字是抗战前三年间在清华大学发表的。最晚的“中国的家族”一篇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一周后的夜间，著者在宁静的清华园，就被卢沟桥的炮声由睡梦中震醒。

“中国的元首”（原名“皇帝制度之成立”）见于《清华学报》。“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原名“中国的家族制度”）、“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无兵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两周”（原名“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都先后见于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除一二字句的修改外，此次合刊仍保留初刊时的原像。

下编中，“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是二十七年二月十三

日汉口《扫荡报》的一篇专论。“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与上下两编前的总论，都是特为此次合刊而作，前此未在他处发表。

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雷海宗于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目 录

序 / 1

上 编 / 1

总论——传统文化之评价 / 3

一、中国的兵 / 4

二、中国的家族 / 53

三、中国的元首 / 72

四、无兵的文化 / 92

五、中国文化的两周 / 117

下 编 / 149

总论——抗战建国中的中国 / 151

六、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 / 154

七、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 / 160

附 录 / 167

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 / 169



上 编

总论——传统文化之评价

本编各篇都是对于中国旧文化批评估价的文字。前三篇由三个不同的方向探讨秦汉以上的中国——动的中国。第四篇专讲秦汉以下的中国——比较静止的中国。第五篇合论整个的中国历史。五篇文字当初虽曾分别问世，但勉强尚有一贯的线索可寻，内中大半可说是非议与责难，但并不是无聊的风凉话；又有一部分是赏鉴与推崇，但并不是妄自尊大的吹嘘。此中自赞的话，已由抗战的过程证明为真言；自责的话，至今也无修改的必要。此次抗战，是抗战而又建国。若要创造新生，对于旧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尤其是短处，我们必须先行了解。中国文化，头绪纷繁，绝非一人所能彻底解明。这几篇文字若能使国人对于传统的中国多一分的明了，著者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一、中国的兵

(一) 春秋

(二) 战国

(三) 秦代

(四) 楚汉之际

(五) 西汉初期

(六) 汉武帝

(七) 武帝以后——光武中兴

(八) 东汉

(九) 后言——汉末至最近

历代史家关于兵的记载多偏于制度方面，对于兵的精神反不十分注意。本文范围以内的兵的制度，《文献通考》一类的书已经叙述甚详。所以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要在零散材料的许可范围内看看由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风气怎样，兵的心理怎样；至于制度的变迁不过附带论及，因为那只是这种精神情况的格架，本身并无足轻重。作者相信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

（一）春秋

四周的兵制无从稽考，后世理想的记载不足为凭。但西周若与其他民族的封建时代没有大的差别，那时一定是所有的贵族（士）男子都当兵，一般平民不当兵，即或当兵也是极少数，并且是处在不重要的地位。

关于春秋时代，虽有《左传》、《国语》内容比较丰富的史籍，我们对于当时的兵制仍是不甚清楚。只有齐国在管仲时期的军制，我们可由《国语》中^①得知梗概，其他各国的情形都非常模糊。按《国语》：

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

这段简单的记载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工商人没有军事义务，因为只有十五个士乡的人才当兵。这些“士”大概都是世袭的贵族，历

^① 《国语》卷六《齐语》。

来是以战争为主要职务的。这个军队的组织与行政组织是二位一体的。

行政的划分如下：

1. 国分十五乡——由乡良人治理；
2. 乡分十连——由连长治理；
3. 连分四里——由里有司治理；
4. 里分十轨——由轨长治理；
5. 每轨五家。

与这个行政划分并行的是管仲所制定的军政制度：

1. 每轨五家，出五人——五人为伍，由轨长统率；
2. 每里五十人——五十人为小戎，即戎车一乘，由里有司统率；
3. 每连二百人——二百人为卒，合戎车四乘，由连长统率；
4. 每乡二千人——二千人为旅，合戎车四十乘，由乡良人统率；
5. 每五乡万人——万人为军，合戎车二百乘；

6. 全国十五乡共三万人——全国三军，戎车六百乘，由国君、国子、高子分别统率。

这是“国”的军队，是由三万家出三万人组织而成。所谓“国”是指京都与附近的地方，只占全国的一小部分。“国”中的居民除工商外，都是世袭的“士”，并无农民。工商直到齐桓公时（西元前685—前643年）仍无当兵的义务。农民当初有否这种义务虽不可考，管仲变法之后却有了当兵的责任；但并不是全体农民当兵，而是拣择其中的优秀分子。据《国语》：

是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
有司见而不告，其罪五。

可见选择农民中的特出人才“能为士者”是有司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以外的地方统称为“鄙”，一定有“士”散处各处，但鄙中多数的人当然是人口中绝对多数的农民。管仲所定的鄙组织法如下：

1. 三十家为邑；
2. 十邑为卒——三百家；
3. 十卒为乡——三千家；
4. 三乡为县——九千家；
5. 十县为属——九万家；
6. 鄙共五属——四十五万家。

国中每家出一人，鄙中却不如此；既然规定选择农民中优秀的为士，当然不能有固定的数目。但《国语》中说齐桓公有“革车八百乘”，而“国”中实际只有六百乘；其余二百乘，合一万人，似乎是鄙所出的兵额。这若不是实数，最少是管仲所定的标准。假定四十五万家中有四十五万壮丁，由其中选择一万人，等于每四十五人出一人当兵。^①所以春秋时代的齐国仍是士族全体当兵，但农民中已有少数由法律规

① 这些数目当然都是大概的成数，并不是精确的实数，但离实数似乎并不甚远。鄙中四十五万家，每家若按五口计算，共合二百二十五万人；若按八口计算，共合三百六十万人。至于国中人多半是士族，行大家族制，所谓三万家的“家”字不知何指。但与鄙相较，国在人口数目上可说无足轻重，我们仍可说三百六十万是齐桓公时齐国人口的最高估计。近代中国人口骤然增加，是与西洋接触后的变态现象，不足为比较的标准。经过清朝一百五十年的太平盛世，乾隆晚年的人口大概可代表中国历代人口的最密限度。按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考》一，乾隆四十八年（此后没有分省的统计）山东人口为二千二百零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一人。这虽也是大概的数目，但自康熙废了人丁税之后人口的统计还大致可靠。这个数目与三百六十万为六与一之比，与二百二十五万为十与一之比。桓公时齐国的领土界限不清，但离今日山东面积的六分之一或者相差不远。即或当时的人口比较后代稀少，《国语》中的记载也与事实大致相合。